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5.013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 “动物叙事”及其文化意味

周银银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 在《生死疲劳》《怀念狼》《公猪案》《刺猬歌》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 奇崛鬼魅的动物叙事成为其叙事典型特征。这类作品借人兽关系融合或变异的文学演绎, 试图破译历史迷局, 勘探现实真相, 再度阐释人性与兽性话题, 直面国法与生存的诘问, 重建诗性正义。在对“野性”的呼唤中, 作者既对乡土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本相和精神图谱进行了生动的艺术注解, 也呈现出他们对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度思考。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动物叙事; 人兽关系; 乡村历史; 诗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5-0104-10

**引用格式:** 周银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动物叙事”及其文化意味[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5): 104-113.

### “Animal Narrativ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Local Novels Since the 1990s

ZHOU Yin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riters have created unique animal narrative in local novels such a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Missing Wolves*, *Boar Case*, *Hedgehog Songs*. They try to decipher mystery of history, explore the truth of reality, explain the topic about human nature and animal nature, response the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people's existence, rebuild poetic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animals in these works. The writers have described the survival condition and spirit world of the silent majority to answer the call of the wild in the rural land. Besides, they express their reflections 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local novel; animal narrativ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country history; poetic justice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生死疲劳》《怀念狼》《福地》《刺猬歌》《猎人峰》《公猪案》等乡土小说中, 作家们于人的世界之外还筑造了庞大的兽世界, 祭出夸张和变形的“法器”, 使它们

**收稿日期:** 2022-03-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介入现实主义’小说研究”(18ZWC0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介入性与公共性研究(2000—2016)”(17BZW165)

**作者简介:** 周银银(1990—), 女, 江苏南通人, 盐城师范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生存的现实空间成为具有神力与魔力的“非欧几里德”<sup>[1]</sup>空间。关于这番波诡云谲的动物叙事，陈佳冀、唐克龙等学者从发生学维度进行了文化溯源，黄轶、汪树东等学者则借助生态理论来探究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对准了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叙事模式等，相关研究成果颇为瞩目。本文以叙事艺术作为研究基点，但更关注的是这种动物叙事的功能表达和文化隐喻。同时，本文还从公共性、时代性和人民性关联的角度重审动物叙事下作家的现实关怀和公共情怀，索解这类作品借人兽关系融合或变异的文学演绎，如何破译历史迷局，勘探现实真相，再议人性与兽性话题，直面国法与生存的颀颀，重建诗性正义。

### 一、命运异质同构：兽的运势与人的命数

在《福地》《河父海母》《生死疲劳》《猎人峰》等小说里，兽与人生活于同一个现实空间，作为乡村历史和现实的亲历者，它们参与并见证着现实的风云变幻及历史的荣辱兴衰。此外，兽还被赋予人的思维及话语，其命运也与个人、家族、乡村甚至国家走向息息相关。从它们的体验出发，秉持“异类”的眼光来重审乡土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现实的突转更迭，既使文本蒙上了奇幻色彩，也经由解构增强了文本解读的多重性，在打乱与重组中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多副面孔，从另一角度揭开事实真相，洞察时代本质。

“70后”作家叶炜，凭借“乡土中国三部曲”在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在其收官之作《福地》，作者以神来之笔构筑了树、鬼、人、兽四位一体的空间。这里，兽的命运不仅与万氏四兄妹的前世今生勾连对接，还和村民一样亲历着肆虐横流的天灾人祸，见证着政治风云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故。具体而言，在麻庄，金猴、黑山羊、青蛇与万家兄妹的生死歌哭牢牢捆绑，兽的命数左右着人的运数，它们也常以通灵方式预言人物的命运走势。最终，兽们相继离去，而万家四兄妹也开启了颠沛流离的历程。在四兄妹的升降沉浮中，因果报应的宿命论似乎坚不可摧。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给人、兽、麻庄带来各种劫难。在“人兽合一”的格局内，作者不仅把苦难的根源指向了宿命，也批判了历史之恶对“福地”的打击。置身于时代的腾挪下，作者特别通过鼠族的命运

来揭示历史的风云变幻。小说中的鼠王总是未雨绸缪，它每一次屯粮都预示着政治变革即将到来，但即便如此，大饥荒年代，它们也同样被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当所有野物被吃光而鼠王倒地身亡的一刹那，人们立刻将其生吃了，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一段隐秘史，这也成为麻庄乃至整个乡土中国的秘密。因为“麻庄，所指向的不仅是一个村庄，也不仅仅是苏北鲁南一个区域的写照，而是指向乡土中国”<sup>[2]</sup>。多年之后，老鼠再度现身，也昭告政治浩劫即将终结。因此，兽类一族从来就不是独立于世，它们的生存空间与人类世界唇齿相依，在联结个人与家族命运时，也指向了多灾多难的乡村和民族大历史，谴责着政治闹剧的非正义性。这种“以小观大”的叙事照应着作者的写作诉求：“小说虽‘小’，但它可以折射大时代，大政治，大命运。”<sup>[3]</sup>

寻根派代表人物李杭育睽违20多年后，带着奇崛之作《公猪案》归来，他将相依为命的猪倌来福和公猪旺财置于太平天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新世纪这三个中国乡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上，在“历史循环论”的操纵下，采取戏谑性与民间化的姿态，以人和畜生轮回往复的命运来对乡村历史进行解构和编码，由此揭开了官方叙述中的诸多迷障，填补了其中诸多空白。作者尤其刻画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旺财及猪族的命运，倚仗兽的生存空间来敞开混乱的时代，颠覆了传统历史叙述，指陈了历史的诸多不义性。比如，作者描绘了江南大营里猪吃人肉、士兵与母猪嬉戏等场景，采取夸张方式揶揄荒唐透顶的时代，以实现其再度省察乡村历史和反思革命意义的意图。当然，对于这些丑态横生的历史图景，无论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县志，还是象征权威的奏折，都视而不见，唯有东穆乡的民间野史笔记上对此有所记载。在小说中，作者有意从民间角度打开讳莫如深的历史画卷，让被遮蔽的时代乱象暴露出来；同时，其也不乏将“稗史”扶成“正史”<sup>[4]</sup>的野心，在展示乡村历史面貌的多样性同时，呈现作家的历史观。除了以猪族的命运观照江南大营的命运，作者还利用它们悲壮的逃亡史来控诉战争造成的伤害。在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不仅人被历史之潮裹挟着前进或倒下，猪的生存空间也同样毁于一旦，它们也被迫承受着时代的

腥风血雨。当人类世界尸横遍野时,猪族儿女们也开始逃亡史。以旺财为首,家猪流落荒野,而战争导致的猪瘟又让它们在接近村庄时被拒之门外。借助它们流离失所的命运,作者昭示了特殊年代历史的刀光剑影。

质言之,作家们依托荒诞之笔将人和兽的命运缀合起来,其尽管包含传奇色彩,但目的仍在于陈说特定时空的乡村人世变幻。他们希望在奇譎多维、人兽同构的世界里,以未经斧凿的角度穿过历史壁垒,掀开现实面纱,透视乡土社会的吊诡之处,揭开被传统历史叙述掩盖的秘密,为解读历史提供另一条通道,并因此增加现实叙述的多重可能。正像热衷于动物叙事的王松所说,“我作为一个作家,只想让自己的作品为将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乃至考古学家提供另一个视角。”<sup>[5]</sup> 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是有意义的形式。”<sup>[6]</sup> 在这些以兽的生存空间和命运遭际来反观乡村的作品背后,呈现的也是作家理解世界方式的变化,比如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不可靠叙事”的热衷。同时,其也映射了作家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新思考,他们在重述历史时,常流露出颠覆传统历史、怀疑历史理性的文化心理。当然,对历史“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sup>[7]</sup>的背后,凸显着他们公共精神的突围和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反思。

## 二、善恶模式破译:人性与兽性话题的再阐释

当作家意欲通过人兽纠葛来探讨乡村现实和历史时,必然绕不过“人性与兽性”的话题。其中,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就存在“人兽和谐”“兽善人恶”“兽恶人恶”等典型模式。这也说明作家并非秉持善恶二元论。在不同模式下,他们将人性与兽性作为一把钥匙,去索解历史长河中怪相频发的原因,探测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存在乱象的根源。人性和兽性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从这个角度去追问历史,无疑也是有效的。

### (一) 人兽和谐

在《福地》《放生羊》《怀念狼》《刺猬歌》《羊群入城》等作品中,作者绘制了“人兽和谐”的画面,其中不少是“动物报恩”模式的衍生。比如《福地》中守护万家兄妹的黑山羊、青蛇、猴子都是老万在洪灾中抢救下来的,因此,当它们预测老万家

即将遭遇不测时,就开启了报恩模式;《怀念狼》中的狼被贴上“恶魔”标签,但它们却与红岩寺的老道士缘分颇深;《刺猬歌》中的神人霍老爷和旷野精灵情投意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与兽和睦相处的空间里,宗教元素常楔入其中,比如《福地》中的通灵动物与盘龙道观的渊源,《放生羊》中的羊和佛教的融合。自古以来,宗教与兽之间就存在奇妙的情愫。当然,在宗教历史中,人与动物的关联存在不同的形式,“宗教史中人与动物相遇经验常常是物理的、现实的真实存在,但也常常以譬喻式的、想象的、象征的方式出现。”<sup>[8]</sup> 这也与远古时代人们的动物崇拜相关。作为一种象征符码,动物在宗教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成为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窗口。在这些小说中,宗教与兽的结合不仅为故事增添了传奇化色彩,还使其具备了高蹈的精神质地。更重要的是,宗教在小说中常成为拯救众生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乡土大地上灵性邪魅的兽同样担负了这一重任。只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宗教救赎是化为乌托邦还是真正消解苦难、实现心灵的超脱?这个问题背后折射的既是作家宗教观和生命观的迥异,也是他们对艰难蹉跎中的众生如何突破困境的思考。

### (二) 兽善人恶

相比“人兽和谐”的空间相处模式,作家更热衷的是“兽善人恶”的情景再现。他们不仅将乡土世界无名的动物推向文学舞台的正中央,与人类分庭抗礼,还打破了既定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让居于被贬低处境的猪、狗、驴等动物获得了翻身的可能,设计出畜生道和人道相互颠倒的格局,尽显兽世界的侠肝义胆。毋庸置疑,这种人道与兽道的置换,是对人们传统阅读习惯的颠覆,也带来了丰富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同时,在读者“震惊”的文化体验中,作家指引大众从人性和兽性维度回望人心,拷问灵魂,审视人的生存境况尤其是精神困厄。这也是他们的信念,“动物没有语言,却能发声,发声就是语言,就是文学。”<sup>[9]</sup>

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猪在民间通常是好吃懒做的代名词,但在乡村历史风云的变幻中,作者极尽能事书写的是猪十六的重情重义。它在亡命途中始终扮演英雄角色,成功占领沙洲后又与冤家刁小三化敌为友,最后返回人间的见义勇

为则再次印证了它不计前嫌的品格。如此，其智勇双全的侠士形象跃然纸上。与猪相比，人则黯然失色，因为人不仅整日勾心斗角，还对猪族赶尽杀绝。在人猪大战告负后，这些人以纵火的方式让沙洲上的猪遭遇灭顶之灾。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中，陈应松以侠骨柔情的老豹“斧头”为视角，突显“斧头”的英气血性和豹子家族的众志成城，烛照山下猎人经由金钱诱惑、权力趋鹜、人性畸变而横生的丑陋嘴脸，折射出人类世界崩离析的伦理亲情。正是在斧头多愁善感的自述中，小说呈现了人性与兽性的显豁对比，带给读者惊心动魄的体验，促使他们谛视现实。

在《越过云层的晴朗》《太平狗》《红豺》等作品中，同样不乏兽善人恶的残酷风景，而且重情重义的兽最后都被人类荼毒。这种描写既印证了“人类的每一员对动物世界的习惯心态都是帝王式的”<sup>[10]</sup>论断，也突出了人道的阴鸷冷漠。当然，以笔代刀扎向人性荒原并非终极目标，在恶中追逐善才是文学的向生之路。

### （三）兽恶人恶

陈应松、莫言、张炜等人的小说中还存在“兽恶人恶”的形态，这种设置不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使之在恶恶相撞中达到高潮。当然，在撕开人性之恶的面纱以及展开兽性肮脏的皱皮中，既有惊天动地的人兽大战，也存在悄然而无声的决斗，抑或刻意为之的变形。不管哪种模式，残酷和暴力都从未退场。

在“兽恶人恶”的模式中，作家们擅用变形策略。他们将人直接变形成兽或与兽互相置换，或将人比作兽，以此来隐喻人性批判、文化批判和现实批判。比如《猎人峰》中，就经由“人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兽，兽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人”的传说，设计了“人”与“兽”的置换场景，《怀念狼》与《刺猬歌》则通过比喻和象征让人披上兽的外衣，这其实是“他者”强行赋予的变形。不过，要想实现批判诉求，作家们预设的前提是将兽“恶魔化”。在变形的“文化陷阱”<sup>[11]</sup>里，他们意欲揭露的是人何以变形，人性中的兽性为何潜滋暗长，又在怎样的社会氛围下爆发。当然，对于变形以及兽性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乡村历史和现实中的荒诞因子，因为正是它们培育了造恶的土壤，导致了人性的异化。

这些作品无论是表现实在的变形，还是将人直接比作兽，其艺术手段都相对清晰，社会批判意图也较明显。与之不同，范小青、鬼子等作家的作品则是通过幻想将人变成“鼠”和“狼”，作品渗透出精神变形的意味，并上升到了对存在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关注，其力图从变形中剖析灵魂的暗疾。以《我的名字叫王村》为例，小说中的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妄想中把自己变形成老鼠，并模仿老鼠的行为祸害左邻右舍。这一层面仍是显见的以兽恶喻人恶。不过，当结局中弟弟的名字被一语道破，其即为王村时，意义就深化了，因为这暗示着王村的变形，而王村又是乡土中国的缩影。也即，弟弟变形的终极指向在于乡土大地的变异，诘责的是乡土“恶之花”的绽放。在小说中，作者以戏谑口吻展示了怪诞的人间图景，包括基层权力运作机制蜕变的艰难，权力与资本媾和导致的失土、失乡、群众法律意识的淡薄等。同时，在人与老鼠的斗智斗勇以及弟弟的变形后被丢失与“我”的三度寻找中，作家还呈现出现代人的精神迷失史和异化史。“我”在丢掉弟弟和寻找弟弟之间逡巡不前，彰显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与乡土灵魂的变异。因此，在“我就是我”“我不是我”“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等错乱呓语和身份迷宫中，“我是谁”的哲学命题再次被提出，其隐现着人们的孤独与迷惘。因而，寻找弟弟也就意味着寻找自我。当然，这也代表着小说作者在寻找良知、真相和“有根的”故乡<sup>[12]</sup>。

在变形艺术的操纵下，兽的“恶”通常是被人类以某种历史偏见先天赋予的。无论是暴力、贪婪抑或自私，兽都在象征中被妖魔化，成为罪恶的担当者。不过，在“兽恶人恶”的模式中，依然不乏两者正面交锋的情形。那么，兽世界的恶是如何被激发的？恶恶相撞下包含着怎样的文化隐喻和现实批判？

王松的《双驴记》构造了人与驴的对垒情节。小说中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黑六和黑七本来也是安分守己的，那么，它们如何走上了疯狂作恶的不归路？黑六和黑七出身不好，但黑六却凭借得天独厚的生理条件获得了优厚的待遇，这引起了知青马杰的不满。他先用酷虐的独门鞭法企图制服黑六，让专司配种的黑六去参加体力劳动。

马杰的暴戾行为既昭示着他对黑六历史身份的鄙夷,也隐喻他对黑六生命力的畏惧和嫉妒。马杰残忍改造黑六,并将黑六送上了断头台。不巧的是,黑七目睹了黑六被杀的惨烈,也埋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此后,它与马杰展开了殊死较量。狡诈阴险的黑七以纵火案、倾倒炭灰入井、展览马杰与彩凤同床共枕的画面、故意滑坡等“恶作剧”方式,对马杰进行报复。当然,马杰以同样惨无人道的招数“回敬”黑七,比如用烤白薯烫、深夜以沾酒之鞭毒打、克扣粮食等等。在刑罚盛宴中,马杰享受着发泄生命力的欢乐。最终,故事以黑七的自焚降下帷幕。

在这场人驴搏斗中,作者演绎了人性之恶与兽性之恶相互激发的血泪史。马杰人性中的自私、残忍和暴力因子打开了黑七身体中兽性之恶的阀门,而驴的恶又催逼着人性的恶的爆发,由此构成恶恶相报的模式。当然,作者最终指向的是非常岁月中人性的畸态,表现的是暴力魔种在霉变土壤里如何疯长。当人性之善渐趋泯灭时,理性也遁影无形,这才会上演荒唐的人驴之斗。借着“兽恶人恶”的模式,王松对特定年代的人性进行了清理,敞开了知青幽暗的心理命门,对他们被钳制许久因而坍塌的精神世界完成了精准的勘探。

《生死疲劳》《木匠与狗》《河父海母》中也不乏大规模的人兽混战场景。在狂欢化的闹剧中,人与兽的恶=在广场空间上进行着突围表演。当然,作家并未局限于对传奇化场面的渲染,而是把探秘的触角伸向了乡村土壤的核心岩层,追问闹剧频发的原因。通过狂乱的战场,作者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变异。

### 三、生态伦理的价值之辩: 国法与生存的颀颀

作家们还借人兽关系的营建表达了对“国法和生存”命题的新见解。1990年代以来,国家制定了多项生态环境保护法,但是,对靠山吃山的百姓、遭受野兽攻击的居民以及荣光无限的猎人而言,国法的颁布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况,导致了困顿的生活、集体爆发的肉体病变和精神阵痛等后果。作家们捕捉到了国法与生存之间的角力现象,并以文学的方式对此话题进行了更人性化、情感化和个性化的阐释,以展示“人”

在政策变迁下的心灵挣扎。他们试图通过对这一命题复杂性的呈示,激起读者对法律制度的考量,促使他们在反思中重建公共精神。

对受过猛兽侵扰的乡民而言,禁止捕猎无疑将其推向了梦魇之境。这不仅因为他们是野兽发狂下的受害者,还由于在人们的文化偏见中,猛兽常作为“恶魔性因素”而存在;所以,乡民们对禁捕规定表示怀疑、不解和抗拒。比如在《怀念狼》中,作家筑造了狼群空间。雄耳川的居民几乎都遭遇过狼的进犯,普遍怀有“仇狼”情结。在他们眼里,遇狼而杀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他们对护狼律法的出台难以置信,因此面对昔日的猎狼英雄傅山放狼归山的举动群起而攻之,对“我”这个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护狼宣传更是嗤之以鼻,并由此仇恨城市。《猎人峰》中“文明”的山外人副乡长看到神农山区捕杀野物的行为后不禁感慨,“这多么野蛮。请你们善待动物。”<sup>[13]49-50</sup>然而,面对禁止猎杀野猪的法律,深山乡民无法理解,“猪是恶兽,猪都保护,咱活生生的人谁保护了?”<sup>[13]100</sup>在这里,野猪隔三岔五侵扰百姓,因此,人们质疑着律法的公平性,在山里山外的观念对弈中还放射出仇视山外文明社会的信号。作者反复强调村民的敌对情绪产生的原因:“大山里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充满了搏斗,到最后人还是要猎杀动物,否则你没法生存。”<sup>[14]</sup>这也许和环保主义理念相悖,但从人兽关系的复杂建构中,的确烛照出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除了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对于靠山吃山的乡民来说,禁止捕猎同样斩断了他们的一大经济来源。这种山民的经济生存与动物保护之间的冲突也是作家难以释怀的话题。从乡民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打那些野牲口,哪有什么仇啊,人穷了呗,靠山吃山呗。”<sup>[13]167</sup>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困窘的生存之状,因困窘而偷猎盗捕甚至杀人的现象层出不穷。借着血淋淋的事件,作家想诘问的是:到底如何改善大山深处百姓的生存状况?这也是心怀现实的作家念兹在兹的议题,更是他们留给读者反思社会、制度、文明的契机。同时,作家们也希望“明智的旁观者”<sup>[15]</sup>在阅读小说时,能通过“移情”活动激起同情之心,了解现实世界里的边缘群体,关切被遗忘者和被损害者的生存困

境，重视他们的生存诉求。就这样，在情感的共鸣中，作品催生出了更有温度的正义，即努斯鲍姆口中的“诗性正义”。

猎人世界与兽世界往往既对立又缠绕。国法的颁布给猎人的生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让他们产生了肉体异化和精神病变。在《怀念狼》中，作者描写了猎人们在猎枪被缴、禁止捕狼后集体患病的症状，比如迅速衰老、软骨症、头痛病、手腕变细，甚至性功能丧失，等等。《猎人峰》中的猎人白秀则患上了梦游症。比肉体变异更可怕的是精神病症，《怀念狼》中的猎人们变得食寐不安、疑神疑鬼。《猎人峰》中曾经的山冈猎王死而复生后竟落得个疯癫下场。在文学领域，疾病一直被加诸了多重隐喻，然而，苏珊·桑塔格却呼吁让疾病回归疾病本身，她提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sup>[16]</sup>在《怀念狼》和《猎人峰》中，作者呈现了属于疾病本体的疾病，但在肉体变异和精神创伤背后，其也指陈着另外的含义，即猎人们对前半生存在意义的怀疑和对后半生生命价值的迷茫。其之所以在个人存在层面产生强烈的惶惑感，导因于其猎人身份的被动且强制性被剥夺。

比如在《怀念狼》中，捕狼队队长傅山43岁的时候，州行署颁布了禁止捕狼的条例，队员们上交枪支，捕狼队随之解散，猎人的空间瞬间崩塌。与此同时，“为狼而生”的舅舅竟从一代猎王变为“护狼使者”，还成为了制定禁猎狼条例的主要参与人。不过，被迫的身份转换给他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尴尬和悲哀。对于那些收山的队员而言，卸下猎人身份并非他们所愿。他们之所以不认同法律条例或不甘于接受身份改变，与猎人的英雄情结、传统使命意识以及对猎人价值的认知休戚相关。

在小说中，猎人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英雄情结的产生与当地人和猎者对狼的认识有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将狼“恶魔化”的仇狼情结在乡民心中牢不可破。面对不断被狼侵袭的古城，猎人们的捕狼行动击退了敌人，保障了乡民的生命安危。站在乡民立场上考虑，猎人的行动极具正义感，他们也由此换来了全城人的敬重。猎人

当然接受这份荣光，他们把基于自身生存的捕杀行为自动上升为除暴安良的英雄之举，猎狼者在道德层面获得了巨大的存在意义。除了英雄光环的激励，作为猎人，也只有在与猎物的殊死搏斗中，他们才能强化血性精神，彰显存在价值。在与强大对手的对决中存在，这是原始的生存哲学观所驱使的。新律法的颁布，一方面是对他们英雄行为和英雄情结的否定，挤压着他们的“神圣空间”<sup>[17]</sup>；另一方面，他们因被迫禁止捕狼而失业后，缺乏了生活中的对手，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空间的迷失，导致他们的生命力无处发泄，肉体和精神都迅速萎缩。

那么，身处绝境，猎人们该如何解决精神危机，减轻身体病痛？作品提供的出路是：在模拟、幻想、回忆和庄重的仪式感中变相地获得心理补偿。比如在《怀念狼》中，舅舅虽然明白现在不再是英雄的时代，但他始终不愿卸下猎人的戎装，他的猎枪永远磨得光滑锃亮，脚上穿的总是麻鞋，他极力以仪式感来维系猎人尊严。《猎人峰》中，猎王白秀的身份标配即为枪，对他来说，缴枪等于夺命、失魂，意味着猎王的陨落。

除了仪式感的维持，在《怀念狼》中，猎人们几乎“全凭着回忆过日子”。他们沉湎于过去的荣光岁月，喋喋不休地讲述打猎往事，以此填补心灵空间的消逝。连因捕狼入狱的“狼挖脸”也拒绝别人喊他实名“成义”，而对“狼挖脸”这一绰号一往情深，因为“狼挖脸”的时代里残存着独属于他的精神骄傲。“‘怀念狼’所怀念的，其实是对一种精神状态的渴求。”<sup>[18]</sup>《猎人峰》中的白秀，也总是在梦游中回到与野猪大战的辉煌岁月。

在《怀念狼》中，猎人们最疯狂的举动是在无狼可猎的时光里，他们通过“狗撵兔”的游戏代替“人猎狼”的活动。他们试图在狗兔大战的闹剧和看客围观下，找回被剥夺的猎人价值。

“他们无任何利益目标，只纯粹为着要发狂一次。”<sup>[19]</sup>“发狂”，除了再次为捕猎行为赋予价值，也是他们试图挽回生命力的标志。正如贾平凹强调的，“作为一种生命，人需要一种对抗性的东西，如果一种对抗性的东西消失以后，他需要活下去，他必须在他的血液中保持一种对抗性的能量。”<sup>[20]</sup>《猎人峰》中，同样多次出现“人猪大战”“猪

狗大战”。猎人们以闹剧、乱剧掩饰颓唐,在广场式空间内释放猎人天性,寻找对抗性因子,享受他者认同,以获得虚幻、暂时的精神满足。

既然是虚幻、暂时的精神满足,说明靠回忆、模拟、仪式感等形式来怀念“有狼的风景”时代终究无法解决个体存在意义的危机。在《猎人峰》中,猎王白秀在幻觉中大开杀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在他眼里都成了宿敌野猪。其疯狂杀戮的结局是缴枪和卖枪。最后,老人丢了魂,在与野猪的对决中惨死。在《怀念狼》中,舅舅和烂头在调查15只狼的过程中开启了猎狼模式。这种以护狼始、以猎狼终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终,狼群被灭,猎狼队里唯一的猎枪也被政府没收,兽的空间和猎人的空间都土崩瓦解了。舅舅被剥夺了最后的精神安慰后,在猎狼与护狼的身份悖论中越发找不到归属感,竟化身“人狼”。更离奇的是,雄耳川的人因为舅舅打抱不平也集体变成“人狼”,这不啻为群发性的“抽风”盛况。此番畸形模仿行为与勒内·基拉尔提出的“摹仿性欲望”现象具有相似性,即“摹仿另外一个人的欲望会将这个人变成模体同时也变成竞争对手”<sup>[21]</sup>。舅舅俨然被这种欲望钳制着,且传染给了雄耳川人。此处,对劲敌“狼”的摹仿,充分映射了舅舅及众人的精神世界全线崩塌。他们埋头于这种扭曲的摹仿,试图通过自欺欺人来转移精神痛苦,但这注定是无望的救赎。可以说,在荒诞的变形和群体的主动退化背后,是现代强制性的生态话语与乡民传统狩猎话语之间的巨大隔阂。作者设置魔幻结局并非要求向“有狼的时代”返程,而是憧憬以双方之间的冲突来激发读者重审人与兽、人与自然的关系,挖掘潜藏于法律、制度表层之下的种种社会因素与人性人心的缠绕。

#### 四、重建诗性正义:野性的呼唤与沉默的大多数

##### (一) 自由的风暴与失语的众生

与人类相比,兽的野性魅力吸引了作家。他们从兽身上发掘到自由与反抗的因子,这番因子激发的生命活力足以穿透历史障壁和现实堡垒。1990年代以来,作家们在乡土小说中汲汲建构兽的世界,其旨归之一即为对野性的呼唤。在阵阵呼唤声中,他们将特立独行的兽与芸芸众生进行

比照,为乡土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数”苦涩的一生索求答案。在强调国家、民族和集体的东方文化土壤中,大多数农民往往屈从于匍匐在地的生存方式,缺乏个性意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被历史之潮裹挟前进,有时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有时又成为最无知的施暴者。除了反思历史的意图,对于光怪陆离的乡村现实而言,作家们憧憬以野性唤醒现代人的生命活力,希望众生能在现实怪诞中坚守正义,保持对公共生活的关注。

比如《生死疲劳》中,由西门闹转世而来的驴、牛、猪、狗都追求野性的自由,在它们身上,“多的是狂欢气质,多的是抗争意识”<sup>[22][24]</sup>。西门驴面对野狼勇猛战斗,西门牛面对毒打、穿鼻孔、火烧等刑罚从未跪下牛蹄。猪十六更是冲出人类的牢笼,到沙洲上建立了独立王国。大头儿在回忆六道轮回的过程中不断重温着光辉时刻,在它看来,“我就是生命力,是热情,是自由,是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命奇观。”<sup>[22][16]</sup>因此,无论是驴的去势、牛的被砍角,还是猪的被阉割,这种对其原始野性的剥夺都演变成它们的耻辱。莫言在兽的世界里表达着对自由、反抗、野性的欣赏,是因为它们身上的“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的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sup>[22][19]</sup>。大头儿蓝千岁的出世是对这句话的印证。和《红高粱传奇》中的豆官、《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如出一辙,他们身体的畸形象征着特殊历史或现实中诞生的精神侏儒,意味着“种”的退化。故而,作者借兽的视角表达着对丧失生命激情的现代人的质疑,也揶揄着失却自由的极端年代。贾平凹、陈应松、张炜等人同样在小说中彰显着兽的野性和狂放,折射出对自由、力量和本真的迷恋。当然,在崇尚野性的背后,人性如何凸显,理性怎样张扬,是作家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 (二) 正义的伸张与邪恶的生长

作家们在呼唤野性的同时,也不忘还原某些兽类的“英雄”面目,让它们不仅于在兽的世界里惩恶锄奸,还在人的世界里担当侠士。此时,兽性的爆发,脱离了缠绕它们的“恶之花”,成为伸张正义的利器。当然,在人兽互动中,这种略显畸态的拯救方式本就宣告了时代的变异,隐喻

着对权力、制度、文化等的批判。

李杭育在谈及《公猪案》时毫不讳言：“人有猪性的一面，猪却也有人性的一面，我笔下的猪，反而是整本书里最有担当的。”<sup>[23]</sup>《公猪案》中的旺财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典型。比如在土改时期，曹得标打着革命的幌子随意发泄私欲，无端枪毙了仇人连升，疯狂蹂躏梨花、欺压才庆。在暴虐景观中，大多数人都是看客，唯有旺财冲出来朝曹得标猛扑过去，成为“正义的复仇者”。对野地和莽林一往情深的张炜，同样向往兽世界的英雄豪气，“人面对一只可爱的动物，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刻看到它们表现出的勇敢，内心里常常会泛起自愧不如的羞愧感。”<sup>[24]</sup>在张炜的《刺猬歌》中，兽的世界与人的世界融为一体，兽们有情有义，在干预人的世界时常仗义相助。比如当霍府失了主人，家丁们谋划造反时，霍公生前的生灵好友们在林中设宴，用毒蘑菇汁解决了家丁。在陈应松的《乡长变虎》中，化身为虎之后的乡长，俨然正义的化身。

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并未抑制兽性。在他们看来，面对现实的刀光剑影，人性似乎无能为力，唯有兽性激起的愤怒和暴力才可能唤回正义、惩治邪恶。当然，从深层意义上讲，其本身就象征着当时社会秩序的反常和价值观的错位。面对此番反常现象，作者不排除暴力和兽性的作用，正如陈应松所强调的，“暴力是觉醒的一种象征。”<sup>[25]</sup>只是，这种伸张正义背后的伦理值得追问。兽为人类生发的“正义的复仇”是否没有罪过？从创作的现实看，这些作家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往往自认怀揣愤怒感和正义感在写作，却并未对此番行为下的罪行进行严肃清理。

### （三）个性的张扬与孤独者的逆行

在野性的魅力中，兽的个性弥足珍贵。这一点，兽与人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因为，乡村中同样存在秉持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的人。当作家打开记忆闸门，试图对乡村历史进行省思时，往往选择让坚不可摧的兽与人间极富个性而又孤独的边缘者相伴。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国家与民族……我们首先注重的是整体”<sup>[26]</sup>。拥有个性的人会演变成异数，面临尴尬的身份认同和孤独的存在困境。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年代，乡土众生被“革命、牺牲、奉

献、解放全人类”的英雄情结所引领，规避自我，陷入“集体无意识”中。所以，那些狂欢潮中依然保持理性和个性的人就沦为“局外人”。此时，作家们让兽登场，充当孤独者的左膀右臂，给予在历史大潮中逆流而上的叛逆者以反抗的勇气，尽管这种反抗常以失败收场。当然，此番安排只是作家的无奈之举，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反思失去自我的时代。

在莫言的小说中，动物与孤独者相伴的例子不胜枚举，《生死疲劳》对此的书写最为集中，小说中，莫言刻意塑造了蓝脸这个反抗者形象。在当时兴办人民公社的主潮中，他逆流行走，成为全国唯一的单干户，因而备受唾弃。其实，在红色普照的年代，蓝脸面部的蓝痣本就寓意着与众不同。此时，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有着浅蓝色鼻孔、蓝宝石般眼睛的西门牛。西门牛跟随蓝脸开始了单干历程，它用忠诚和血性守护着蓝脸这位孤独前行的“英雄”。牛棚这一私密化的空间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最后，宁愿葬身火海也不愿为人民公社服务的西门牛倒在了蓝脸的土地里，上演了中国土地史上最揪心的一幕。其实，作者极尽所能地渲染西门牛的抵抗，既是为了给乡村边缘者蓝脸安慰，也是让读者思考如何看待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异类”，以及这类异端者的人生在官方叙述和民间视角中是如何被书写的。

其他作家的乡土小说中也不乏兽与孤独者结成英雄联盟的例子。《失语的村庄》中，洞察一切的母猪看麦娘和少年锁子心灵相通，一起对抗着农民的集体失语。《刺猬歌》中的毛哈与廖麦为伍，他们同为现代文明社会下的异类，各自以肉体和精神抵抗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与兽同为“文明”世界的边缘人，在人兽同心同行的步伐中，烛照着作家对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悲悯，折射着他们从权力、制度、伦理、法规等维度生发的对中国乡土大地重重苦难原因的追问，也促使他们对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兽性与个性话题进行再度思考。

### （四）野性的回归与农耕文明的呼唤

作家们对兽身上的野性因子和旷野气息如此痴迷，还源于他们对农耕文明时代的怀恋。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急遽发展，农耕文明走向衰微。面对土地、家园、故乡的失落和“乡村共同体的



解体”<sup>[27]</sup>，诸多作家忧心不已，尤其是那些持文化守成姿态的作家，更是沉湎于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恰好，兽身上带有原始自然的印记和蓬勃的生命活力，它们在自由行走的世界里，也拒绝着工业文明对其肉体和精神的阉割。这样，兽携带的精神气质与作家的诉求不谋而合。这些作家以公开歌颂野性魅力的方式，或借这种野性被迫丧失以及兽的反抗行动为农耕文明唱着赞歌和挽歌，也就不奇怪了。当然，这样的价值观是否合理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张炜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表示，他甘愿为野地充当守夜人。比如，在《刺猬歌》中，作者采用了现在和过去相交织的手法，这种近乎共时性的时空场本就彰显了文化坚守姿态。作者特别通过美蒂身上野性的消失、人们对野物的鄙夷唏嘘着传统文明的衰落和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美蒂是刺猬的孩子、野地的精怪，莽林之间旷野的气息和原始的激情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资本侵蚀，美蒂的野性精神也逐渐沦陷。当廖麦拉着美蒂睡在菊芋杆上企图重温当年野地相会的热烈时，美蒂却对后背被硌出血而耿耿于怀。正是在对野地的遗忘和背叛中，这位莽林女儿“作为刺猬的最后特征——脊部那一层呈倒八字的金色绒毛”<sup>[28]354</sup>消失殆尽。作者通过美蒂野性标志的褪去隐喻着时代变化。当野物都臣服于工业文明的威力之下时，恰好印证了“我们走进了默默中蛊的时代”<sup>[28]324</sup>那句话。当然，作者还试图通过毛哈这一具有反叛精神的兽来抗拒工业文明。毛哈是野猪之子，它的出现本不该引起恐惧，因为从前的棘窝镇上流传着太多人兽交媾的传说。但是，来到工业文明时代，毛哈却难为人类所容纳，即使是美蒂也直言“它是一只半人半兽的怪物”。最终，毛哈被作为怪物展览在“水世界”里，成为工业文明下的牺牲品。在人兽情缘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里，作者以野性思维抵挡着工业文明和“物欲大合奏”<sup>[29]</sup>，怀念着野性时代。张炜之所以反抗甚至仇视“飞速发展的这个商业帝国”及现代工业文明，与他童年经历密不可分。张炜的童年一直跋涉在莽野中，而“童年的经验是顽固而强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改变的”<sup>[30]</sup>。因此，当野物消失、莽林被毁后，对童年故地的守望让他成为文学斗士。不过，作

者通过廖麦这个具有浓郁士大夫古典情调的知识分子来表达瞭望麦田的理想时出现了悖论。因为，廖麦一边在精神回溯中疯狂追求自然和野性，拒绝权力、制度、金钱对灵魂的禁锢，一边却又无法完全抵达心灵的自由之境。他的内心存有传统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太多清规戒律，比如和修的爱情，和美蒂的性爱，他都有所顾忌，甚至展现了懦弱的一面。最终，他也无法回归真正的“性自然”，不能成为与野地融为一体的灵魂自由者。

贾平凹、李玉文也通过动物行为传达着对农耕文明的留恋。《怀念狼》中的“我”虽身处城市，然而，“可我需要狼”的呐喊也隐喻了“我”的孤独和对“有狼的风景”的怀念。《河父海母》中，作家以“群鸽簇拥飞离河父海母之地”的邪魅表演来表达对城市化进程的抗拒。毋庸置疑，作家们都将兽的世界作为窗口，透过它们怪诞的行为来打探现实的光怪陆离，在对兽身上野性气息的迷恋中表达对文明的忧思。尽管我们承认立场多元化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小说作家的价值立场不免有些偏颇。原因在于，农耕文明虽不乏诗意宁静，但与工业文明相比，毕竟存在落后的一面，而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来看，工业文明彰显着进步性。当然，工业文明的狂飙猛进同样导致了人性异化、伦理崩塌等诸多社会病症，这同样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必须强调的是，作家在处理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尤其需要凸显出二者冲突背后的复杂性，毕竟，“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sup>[31]</sup>

#### 参考文献:

- [1] 董小英. 叙述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38.
- [2] 叶 炜. 读懂中国人的乡愁, 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创作谈[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6, 32(2): 6.
- [3] 叶 炜, 夏 琪. 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N]. 中华读书报, 2015-08-26(7).
- [4] 雷 颐. “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3): 127.
- [5] 王 松. 关于双驴记之外的对话[M]//王 松. 双驴记.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1: 109.
- [6] 克莱夫·贝尔. 艺术[M]. 周金环, 马钟元, 译. 北京: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4: 4.
- [7] 爱德华·W·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朱生坚,

-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3.
- [8] 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 [9] 陈应松.我们需要文学吗?[J].文艺争鸣,2009(2):115.
- [10] 毕飞宇.人类的动物园[J].雨花,1994(4):3.
- [11] 殷国明.漫话“狼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66.
- [12] 傅小平,范小青.范小青:我不忍心把人物推向极致[N].羊城晚报,2014-06-01(B02).
- [13] 陈应松.猎人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14] 周新民,陈应松.灵魂的守望与救赎:陈应松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7(5):45.
- [15]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9.
- [16]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7.
- [17]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5.
- [18] 王振滔.从“人化的自然”到“人的自然化”:论《怀念狼》中人与自然之关系[J].小说评论,2020(6):30.
- [19] 贾平凹.怀念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56.
- [20] 贾平凹,张英.想把小说写得更纯粹[J].粤海风,2000(5):32.
- [21] 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M].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88.
- [22]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23] 木叶.另一种特立独行的猪,及其死亡:李杭育《公猪案》[J].上海文化,2016(7):30.
- [24] 张炜.动物: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二[J].天涯,2020(4):15.
- [25] 陈应松.写作是一种搏斗:陈应松文学演讲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11.
- [26] 毕飞宇.“毕飞宇”和文学: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M]//张清华.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2.
- [27] 王华伟.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4):111.
- [28] 张炜.刺猬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 [29] 张炜.午夜来獾:关于自然生态文学[J].天涯,2011(3):41.
- [30] 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J].作家,2001(1):81.
- [3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4.

责任编辑:黄声波